

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这段文字，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部翻译、2013年3月第一版、2018年2月第7次印刷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传》中所述。这段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搞新中国建设时，毛泽东的所为，而是1933年5月，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期，所做的工作。

尽管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一定排挤，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但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从此才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在演讲中，毛主席特别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甚至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过去的产量，并把他们大批地输入到白区去。”

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看来，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主要占据江西省的一些地方，以及闽赣、粤赣、湘赣、闽浙赣、湘鄂赣等地，但“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李颖说。

之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成立，有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主观方面来说，随着1927年南昌起义，人民军队从无到有，尽管也经历了数段曲折，但随着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秋收起义、三湾改编，特别是古田会议，为根本上解决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理论、路线和原则问题奠定了基础。由此，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得到了加强。

客观方面来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给国人的感觉并不美好。原本对国民党还

心存幻想的一些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陷入了民国初年以来周而复始的军阀混战的格局。许多原本围攻工农红军的白军纷纷调往军阀混战的前线，造成了后方空虚。这就给了红军发展并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以良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部分，诬称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为。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尽管定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所控制的地方主要在江西，以及福建、广东等东南一隅，距离当时日本侵华的主战场东北尚远，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寇侵华，仍阐明立场。当年9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宣言》。

一个多月后，随着“一苏大会”的召开，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

永安苏区小陶等各乡镇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上千条红军标语，其中有红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时期留下的红军抗日标语，也有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的红军抗日标语。这些标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也付诸实施起来。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了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十多支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主要在南满、东满和北满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1933年，在红都瑞金的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抗战策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率领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在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

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